



SHAN
XI

KAOGUXUEWENHUA
YU
GUDAIWENMING

山西 考古学文化 与古代文明

丰富的考古学资料，可印证古代历史的真伪，补充文献记载之缺失和舛误，是考古学和历史学紧密结合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起源最有效的科学方法……

杨子荣 编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杨子荣编著. —太原市：三晋出版社，2013.03

ISBN 978-7-5457-0717-5

山西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

中图法分类号 K292.5（历史、地理>中国史>地方史志）

书 号 978-7-5457-0717-5

定 价 138.00元

浓缩于三晋的大半部华夏文明史（代序）

李玉明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考古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并通过对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取的古代人类在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各种遗迹和遗物的综合分析研究，得出符合历史史实和发展规律的结论，从而正确认识历史。这就是 1925 年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对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二重证据法”。对首次发现典型文化遗存的自然小地名命名的文化，称为“考古学文化”，如西侯度文化、丁村文化；也有用朝代或国名命名的，如晋文化、北魏文化；还有以地域命名的，如中原文化、草原文化。考古学文化不仅可以佐证历史，而且可以补充和纠正文献记载的不足和舛误。《山西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就是根据山西发现和发掘的大量考古学文化的实物资料，研究和探讨山西古代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起源，补充文献资料的缺失，纠正其记载不准确、不全面或舛误之处。

山西“形势完固”、“表里山河”，地处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草原文化）交汇之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自夏商以来，在山西这块广袤的黄土地上，华夏民族与北方各少数民族长期共处，几千年来在无数次的相互碰撞、交融中，共同创造了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和传承性的独特璀璨的山西地域文化，成为山西考古学文化的最大特色。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学勤评价山西时说：“华夏文明大半部文明史在三晋浓缩，山西是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古老文明液汁的圣地。”在李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7 年 4 月）一书中说：炎黄帝被敬为华夏之祖。“华夏”一词缘何而来？据传在渭河流域古华山之下，有一支远古农业部落对花情有独钟，用花卉图案装饰彩陶，以花为图腾和族徽。古“华”同“花”又有日光之意，正符合远古部族崇拜太阳、向往光明的普遍心理，因此“华”成为这支古部族的族称。当一支由西而迁徙到距华族不远的汾河流域这一片宽阔肥沃的平原时，不禁感叹这片土地的壮大伟美，因当地方言中“夏”字正有此意，于是这片土地便称为大夏，他们也就成为夏人。相传华人与夏人都属炎黄嫡裔，两者地理位置又十分相近，文化特征趋同，于是逐步融合形成华夏族，创造出辉煌的华夏文化。这就是山西成为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缘由。

山西的历史究竟有多悠久，文化底蕴又有多深厚？根据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

明起源》一书中的观点，人类开始制造石器就有了文化。山西迄今发现人类最早制造的石器是芮城西侯度遗址出土的 32 件人工打制的较原始的刮削器、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等石制工具。这些原始的石制品，证实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山西这块广袤的黄土高原上就开始有人类在繁衍生息，过着采集和狩猎的原始生活。据科学测定，西侯度石器距今 180 万年，是山西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化，可称作山西文化之源和最早的历史。这处遗址还发现了人类用火的痕迹，将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 100 多万年。

继西侯度后，先后发现和发掘的以襄汾丁村、阳高许家窑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以沁水下川、朔城区峙峪、吉县柿子滩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标志着山西旧石器时代文化得到了薪火相传，始终没有中断，构成了早、中、晚期自成序列的文化链，这在全国是少有的。其中丁村遗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学家贾兰坡主持发掘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并确立了“丁村文化”和“丁村人”，被视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代表，成为中国旧石器考古的里程碑。

新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制由全盛到衰落的一个历史阶段，经历了仰韶文化（约相当于母系社会）、龙山文化（约相当于父系社会）等几个发展时期。它以农耕和畜牧的出现为划时代的标志，是中国历史长河中古代经济、文化向前发展的新起点。随着生产的发展，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原始社会内部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酋邦制国家出现，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山西新石器时代遗址十分丰富，早期（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及其二期文化、龙山文化等都有重要发现。特别是襄汾陶寺遗址的科学发掘，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新发现。根据发掘出的城址、陶文、宫殿区、祭祀区及观象台、仓储区、墓葬等遗迹；出土的龙盘、土鼓、鼉鼓、特磬、陶礼器、木器、玉器、青铜器等遗物，考古学家确认了陶寺是最早的“中国”所在地；确认了最早的观象台；确认了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确认了中国最早的朱书文字；确认了王级大墓；确认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最早的板瓦等。陶寺遗址距今 4500 年左右，它的发现和发掘，使尧、舜在山西建都的传说变为现实，学界将陶寺视为“尧都平阳”的观点越来越趋于一致，山西 5000 年的文明史从此得到证实，陶寺可谓山西古代文明起源之根。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大致在距今 4500 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群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苏秉琦先生还说：“在中国文明起源

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构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它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也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集团正式形成并由此不断推进民族发展的奠基石”（《中国文明起源》，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由此可知，山西不仅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也是“中国”之名的起源地；陶寺不仅是“尧都平阳”所在，而且是南、北、东、中文化的交汇融合之地。因此，陶寺遗址在中国考古学文化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根据古文献记载，中国在上古时有一个三皇五帝时代，从战国开始到清末民初，三皇五帝在《中国历史纪元表》中有明确记载，不应有丝毫怀疑。然而，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对三皇五帝全盘否定，甚至连夏商周三代的存在也持怀疑态度。随着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从大量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中认识到，三皇五帝是真实存在的历史，并不是空穴来风的传说。这些大量新发现的考古材料，对于追溯中国远古时代，重建中国上古史体系，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详见李伯谦：《考古学视野的三皇五帝时代》，载《新田文化与和谐思想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1版。以下两段文字也参考了李文，恕不一一注出）。

所谓“三皇”，有多种说法，较普遍的说法是指伏羲、燧人、神农，大致对应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距今200万年至5千年。但仍处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伏羲是“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应该是指历史上的渔猎时代。山西大量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古代人类在渔猎活动中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印证了伏羲氏的存在。燧人氏是“钻燧取火，以化腥臊”，是指历史已发展到了人类学会用火的时代。西侯度人类用火痕迹的发现，证实燧人氏的存在不是虚构和杜撰。神农是“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已经发明了农耕。山西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大量农耕工具、加工谷物的石磨盘和窖藏碳化粟子等的发现，证实神农氏的存在并非子虚乌有。

所谓“五帝”，也有多种说法，一般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大体对应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距今4500—4000年。五帝时代已是父系家长制社会，有着众多的或服或叛的“诸侯”国族；有着筑宫室、制嫁娶、作舟车、作弓弩、作棺槨等众多发明创造；社会已发生分化，争斗激烈，战争频仍；已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机构，有了国家的雏型。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以大量确凿有据的考古学材料，证实五帝时代不是虚幻的传说，而是真实的历史。夏代是大禹建立的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初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后迁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其活动区域是“晋南豫西”，即今河南西部的颍水上游和洛阳附近的伊河、洛河下游地区，山西西南部的汾河下

游和涑水河附近。夏文化长期以来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空白，河南从 1959 年起，山西从 1974 年开始探索夏文化，先后发现和发掘了一批夏时期的文化遗存，具有代表性的有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分别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和“东下冯类型文化”，填补了夏文化的空白。“东下冯类型文化”的发现，并结合文献记载，证实夏文化的源头在晋南，而不在豫西（详见王克林《华夏文明起河东》）。山西除东下冯代表性的夏文化外，还在忻州、太原、吕梁、晋中、长治、临汾等地发现了多处夏时期的文化遗存，可见夏人活动的区域不局限于“晋南豫西”，北边已远达忻州一带，扩大了我们对于夏文化的视野和认识。

商周时期（包括商、西周、春秋、战国），山西方国林立，据不完全统计，达 42 个之多（光绪版《山西通志》）。在众多国家中，最显赫的是晋国。西周初年，周成王灭了古唐国（在今翼城县境内），封其母弟叔虞于唐，称唐叔虞。其子燹父改唐为晋，建立晋国，这是山西称“晋”之始。从叔虞封唐到三家分晋，晋国共传 33 代，历时 600 多年。三家分晋后，晋公室又存在了 60 多年，若加上这 60 多年，晋国历时 660 多年。自晋文公开始，在其父晋献公晋国勃兴的基础上，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称霸中原，成为“晋国天下莫强焉”的霸主国家。晋文公开创的晋国霸业一直延续到晋定公二十八年（前 482）晋吴黄池会盟，吴王列兵劫盟，晋国只好退让，标志着晋国霸业正式结束，时间长达 150 年左右。

晋国由一个“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小国发展为一个虎踞北方的泱泱大国，是山西历史上最为光辉璀璨的一页。1952 年在曲沃县侯马镇（今侯马市）发现了晋国最后一个都城“新田”遗址，从 1956 年开始，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和持续的考古发掘，发现晋都城址、宫殿遗址、祭祀遗址、铸铜遗址、盟誓遗址、手工作坊遗址、墓地等重要遗迹；出土了陶范、盟书、陶器、青铜器、玉石器等大批珍贵文物，再现了晋国的辉煌历史。自 1963 年以来，对翼城县和曲沃县交界的天马——曲村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根据大量出土遗迹和遗物判断，该遗址就是晋国始封地和早期都城“故绛”所在地。1992 年开始，在曲沃县北赵村发掘晋侯墓 9 组 19 座，埋葬 9 位晋侯和 10 位夫人（其中穆侯为两位夫人），发现车马坑 9 座，并出土了大批青铜器、玉石器、礼乐器、骨蚌器等珍贵文物。在出土的青铜器中，第一次发现了铸有“晋侯”字样的铭文，其中“晋侯苏”编钟铭文长达 355 字，是迄今发现的晋器最长的铭文。另外，在距北赵晋侯墓地仅 4、5 公里左右的羊舌村发掘一组晋侯夫妻异穴并葬墓，但属哪一位晋侯，学者们看法不一。天马——曲村遗址和晋侯墓地是我国西周时期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文化遗址，它的发现与发掘，是晋国考古的重大突破，以翔实的考古材料证实，晋国的始封地和早期都城就在翼城和曲沃接壤的天马

——曲村一带，从而否定了晋国始封地的其它说法，自汉代以来关于晋国始封地的“笔墨官司”也从此可以画上句号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已故教授邹衡说：“在翼城县的翔山以西，曲沃县的汾水以东、浍河以北，翼城、曲沃二县的崇山（俗名塔儿山）以南，东西长约 30 公里、南北广约 15 公里的长条形地带……就是晋始封地的中心所在。”邹先生在另一篇《论早期晋都》中说：晋之旧都为故绛，其具体地望以前没有定说。晋侯墓地确凿无误地证实，此处就是早期晋都，始自唐叔虞始封之唐，再改称为晋，直至改名为绛，是为故绛。北京大学教授、晋侯墓地发掘领队李伯谦先生说：晋侯墓地的发现和考古研究成果解决了晋国历史上一些难解之谜，纠正了文献有关晋国历史记载上的一些讹误，极大地丰富了晋国史、晋文化乃至西周考古的内容。因此，天马——曲村遗址和晋侯墓地被中国权威专业杂志《考古》列为“中国 20 世纪 100 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晋侯墓地的发现与科学发掘，为我国“九五”（即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年代学的测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李学勤先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山西》一文中说，山西省对该工程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实际上，我们的很多工作都依靠了山西省的成果。这里特别以西周年代为例，有晋侯墓地的科学测年数据，北大和山西省的学者为其做了大量的极其重要的工作。曲沃的晋侯墓地，已发掘了 9 组 19 座大墓，还有大量的小型墓葬，这样的西周诸侯国的墓地是保存最好的，工作也是做得最好的。在晋侯墓地发现之前已发掘的河南卫国墓地、应国墓地、北京燕国墓地、河北邢国墓地等西周诸侯国墓葬，基本上都被盗空。所以，能够有世代连续的诸侯及其夫人的大型墓地及有陪葬墓地的，并集中在一起的，曲沃的墓地到目前为止还是唯一的，没有任何墓地可与之相比。通过测年，曲沃墓地已经为西周年代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考古学上的测年标志，把这个与燕国等考古学材料对比、结合起来，对于建立西周的年代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晋侯墓地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它的时代排列也是非常清楚的，这也为西周青铜器的考古学研究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据此，我认为，山西今后的考古历史方面的研究对于夏商周时代的考古研究会起很大的甚至关键性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太原、临汾、运城、长治等地还发现和发掘了一批晋国和韩、赵、魏三个国家时期的城址、墓葬，如太原晋阳古城址和赵卿大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大大丰富了晋国考古的资料。近年又先后在绛县和翼城发现了西周时期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墓地——偃国墓地和霸国墓地，是山西西周考古的重大新发现。晋国考古是山西考古工作的重头戏，在全国考古领域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所有重要的新发现（包括河南、河北晋国与三晋国

家的考古新发现),《山西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都有较详细的论述。

1985年11月,苏秉琦先生在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晋文化”考古这一学术命题,从此,晋国考古步入了全方位的晋文化研究领域。“晋文化”包括晋国和三晋国家的近千年历史。苏先生认为,“晋文化考古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三项内容:第一,作为中原地区古文化的一部分;第二,作为北方古文化的一部分;第三,作为北方、中原两大古文化的枢纽部分。”他指出:应将分布于山西南部临汾盆地的霍山至稷山间约百公里范围内的考古遗存作为一个专题——晋文化考古;这专题可分两项,一是陶寺——东许;二是曲村——侯马。前者是晋文化的原型(雏形),后者是晋文化的主体。前后两项并非互不联贯,同样在中国考古学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1994年8月,苏秉琦先生在《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上,对晋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晋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座标已可标示出来了。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大约相当距今4500—2500年间的山西南部,从最初把‘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名词发展到成为北方(中原)一霸,占了我们五千年文明史的近半。”可见晋文化在中国考古学文化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秦汉时期,山西是抗击匈奴侵扰的北边重地,长城、烽火台、堡垒、秦汉墓群……千百年来,它默默地倾诉着当年狼烟四起、战火纷飞的历史,形成山西独特的边塞文化。配合平朔露天煤矿建设工程开展的大规模的秦汉墓葬发掘、秦汉长城考古以及其它大量秦汉城址、墓葬的发掘,均取得了重要成果,为研究山西秦汉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佐证资料。

平城(大同)文化、北齐文化,是山西北朝考古的两大重点,考古调查和发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古城址考古。有平城遗址、晋阳古城址。(二)墓葬考古。北魏墓葬基本都集中分布于大同一带,发掘的重要墓葬有方山冯太后永固陵、琅邪康王司马金龙墓、平城镇将元淑墓、幽州刺史宋绍祖墓、沙岭、智家堡、大同电焊器材厂、湖东编组站、大同七里村北魏墓地等。其中沙岭、智家堡墓有精美的北魏时期的壁画,连同太原北齐墓葬壁画,填补了北朝绘画史的空白。北齐墓主要分布在太原(发掘11座)和晋中(发掘2座),其中重要者有太原东安王娄叡墓、武安王徐显秀墓(二墓均有精美壁画)、右卫将军贺拔昌墓、安州刺史贺娄悦墓、车骑将军狄湛墓、相府参军张海翼墓、骠骑大将军库狄业墓、宁朔将军韩祖念墓、虎贲中郎将“喜”墓、寿阳定州刺史库狄回洛墓(发现中国最早的木构屋宇建筑)、祁县韩裔墓等。(三)石窟寺和石刻考古。重要项目有云冈石窟窟前和窟顶北魏至辽金时期遗址的发掘、太原北齐西山大佛、童子寺大佛的清理发掘、沁县南涅水石刻的发掘等。以上这些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大量的考古学信息,对于了解和研究北朝的政治、经济、宗教、文

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太原（晋阳）是隋唐时期北方的军事重镇和战略要地，唐高祖李渊在建立唐王朝之前，长期驻守太原。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任命他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炀帝南下江都，命他留守太原。时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土崩瓦解，他乘机起兵反隋，攻取隋都大兴（今西安），建立唐朝。唐朝建立后，李渊、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李隆基等不忘太原的恩泽，先后回太原探视，并将太原定为北都，与国都长安、东都洛阳齐名。同时，将晋阳、太原二县列为“京六县”，直属京都管辖。还命并州大都督长史李兴建晋阳东城，命并州刺史崔神庆兴建晋阳中城，与原赵简子家臣董安宇修建的西城连接成为一座大城，周长 40 多华里，有城门 24 座，成为唐代北方最大的城市。

山西隋唐考古重要的发现有新绛县的隋代绛守居园池、宁武的汾阳宫遗址、太原虞弘墓、斛律彻墓、汾阳梅渊墓等。绛守居园池是隋代刺史（曾一度州改郡称太守）所在衙署的后花园，是迄今我国有据可查和有遗迹可寻的最古老的园林建筑。虞弘墓是中亚粟特人文化在山西的首次发现，出土的汉白玉石椁（石堂），其精湛的雕刻图像，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被誉为“学界的一次地震”，并成为流散国外时代不明的类似零散图像资料的断代标准。唐代文化遗存，除前述晋阳古城遗址外，墓葬集中发现于太原、长治两个地区。万荣县薛徽墓，是山西迄今发现的首座唐代骝马墓，出土雕刻精美的石椁和石门，被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高于一级）。我国第一次发掘的大型渡口遗址——永济唐代蒲津渡遗址，其铸于唐开元十二年（724）黄河东岸的 4 尊铁牛和铁人、铁山、铁柱，是迄今已知时代最早、数量最多、体量最大、铸造艺术最高的铁质文物，是研究唐代冶金铸造、桥梁建筑等的宝贵实物资料。唐代文化遗存中，本书还著录了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五台唐建南禅寺大殿、敦煌莫高窟五代壁画《五台山图》中仅存的大佛殿五台唐建佛光寺东大殿，以及灵丘曲回寺石像冢、唐宋瓷窑遗址等。

宋辽金元是山西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宋辽对峙、宋金抗争、元朝建立、中原文化和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互相传播和交融，形成这一时期独特的文化风格。如区域特征明显的大量宋辽金古建筑、丰富的戏曲砖雕、壁画、石刻、戏台等文物，是这一时期山西地域文比的最大特色。山西宋辽金元考古，主要是对墓葬，尤其是戏曲砖雕墓的发掘、研究和保护，以及对其它戏曲文物和古建筑、古塔中的秘藏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成果显著。《山西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著录的古平阳地区（包括今临汾、运城、晋城市）丰富璀璨的金代墓葬中出土的戏曲砖雕、北魏至金元石刻、壁画中的戏曲文物、金元木结构戏台等，印证了

山西古平阳地区是“中国戏曲的摇篮”。又《赵城金藏》的保护研究、金代年画《四美图》的发现，证实平阳地区还是金代著名的雕版印刷中心和木板年画之乡。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的发现与研究，是山西辽代考古的重大新成果。

《山西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作者杨子荣同志，现任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他从事文物工作 46 年，积累了大量的文物考古方面的资料，并参考了国家和本省考古工作者的许多研究论著，历经艰辛，撰写成本书。这本大作基本囊括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至截稿时山西重要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成果。特别是对近几年来山西考古的新发现和新成果进行了搜集、整理，全部著录于本书，可以说它是一部全面了解山西考古学文化和古代文明的权威著述和普及考古历史知识的好读物。

热望专家学者鉴赏畅叙！

是为序。

2012 年 7 月初于晋府梅山塔下问龙堂书斋

山西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

核心提示以丰富的考古学资料，印证古代历史的真伪，补充文献记载之缺失，是考古学和历史学紧密结合研究历史和古代文明起源的最有效的科学方法。

根据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区系理论，山西地处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草原文化）的交汇之地，特别是自夏商以来，华夏民族与北方各少数民族长期共处，几千年来各民族相互碰撞、交融和艰苦奋斗，共同发展，创造了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遍性，又有三晋文化自身文化积淀的独特性的地域文化，成为山西考古学文化最大的特色。本书的论述紧紧围绕这条文化主线展开。

山西大量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发掘，证实了山西有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底蕴。西侯度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揭示了山西至少有 180 万年的文化史；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证实晋南是早期“城邦国家”联盟主体即“中国”之所在，山西是“城邦国家”走向专制帝国的策源地；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打开了古代文明的大门，山西 5000 年文明史被确认；东下冯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填补了夏文化的空白；商周时期许多重要文化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标示出了晋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座标；秦汉、北朝、隋唐、宋元等各个时期大量文化遗存的调查发掘与研究，诠释了山西辉煌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学勤评价山西说：“华夏文明大半部文明史在三晋浓缩，山西是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古老文明液汁的圣地。”

目录

浓缩于三晋的大半部华夏文明史（代序）	1
山西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	9
绪言	1
第一章 山西考古学文化综述	3
引子	3
第二章 文化的起源	7
第一节 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概述	7
第二节 芮城西侯度遗址——山西文化之源	8
第三节 襄汾丁村遗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里程碑和中期文化的代表	10
第四节 沁水下川遗址——华北细石器文化的最高水平	14
第五节 山西旧石器时代其他重点调查发掘的文化遗存	17
第三章 文明的曙光	22
第一节 山西新石器时代考古概述	22
第二节 前仰韶文化考古	26
第三节 仰韶文化考古	27
第四节 山西迄今发现最早的仰韶文化时期生土窑洞建筑遗迹	38
第五节 庙底沟二期文化考古	38
第六节 芮城清凉寺墓地——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重要新发现	41
第七节 龙山文化考古	42
第八节 襄汾 陶寺遗址——山西 5000 年文明之根	45
第四章 夏文化的源头	55
第一节 探索夏文化概述	55
第二节 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证实夏文化的源头在晋南	56
第三节 其他重点调查发掘的夏时期文化遗存	58
第五章 繁星璀璨的商周方国文化	62
第一节 山西商周方国文化考古概述	62
第二节 石楼铜器群——商代晚期方国文化的重大发现	63
第三节 “太原光社文化区域”——先周文化的滥觞之地	64
第四节 柳林高红遗址——山西首次发现商代方国方“国都”遗址	66
第五节 灵石旌介商代方国“鬲”方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	66
第六节 其他重点调查发掘的商周方国文化遗址及墓葬	67
第六章 晋国霸业	71
第一节 晋国的建立与勃兴	71
第二节 晋文化考古概述	77
第三节 天马——曲村遗址，晋国始封地与早期都城“故绛”的所在地	85
第四节 晋侯墓地——晋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	87
第五节 侯马晋国“新田”遗址——再现晋国后期的辉煌	92

第六节 晋国赵氏家族的根据地——晋阳古城的兴衰	107
第七节 晋与三晋时期的其他重要城址	111
第八节 晋与三晋时期的其他重要墓葬	114
第九节 晋和三晋时期出土货币	123
第十节 绛县横水“邰国”和翼城大河口“霸国”墓地——西周考古的重要新发现	124
第十一节 河南、河北两省的晋文化研究	127
第七章 秦汉烽火	135
第一节 山西秦汉考古概述	135
第二节 原平扶苏庙与蒙恬寺——一代戍边英豪的千古奇冤	137
第三节 平朔秦汉墓群发掘——中国最大规模的秦汉考古	138
第四节 重点调查发掘的其他汉代城址及秦汉墓	142
第五节 秦汉长城考古	151
第六节 山西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黄河古栈道石刻遗迹考古	152
第八章 北朝前期的政治文化中心	154
第一节 山西北朝考古概述	154
第二节 北魏都城——大同平城遗址	156
第三节 大同、朔州和太原的北魏与北齐壁画墓——填补了北朝绘画史的空白	159
第四节 其他重点调查发掘的北魏及北齐墓葬	161
第五节 石窟寺与石刻考古	168
第六节 沁县南涅水石刻——山西石刻艺术的集大成者	175
第九章 唐王朝的发祥地	176
第一节 山西隋唐考古概述	176
第二节 太原隋代虞弘墓——中亚粟特人文化在山西的首次发现	178
第三节 新绛绛守居园池——中国有据可查和有遗迹可寻的最古老的园林建筑	180
第四节 《晋祠之铭并序》——李世民的太原情结	183
第五节 太原、长治具有区域特色的唐墓	186
第六节 万荣薛徽墓——山西迄今发掘的首座唐代驸马墓	188
第七节 永济蒲津渡遗址——我国第一次发掘的大型渡口遗址	189
第八节 山西唐宋瓷窑遗址	190
第九节 五台南禅寺唐建大殿——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	192
第十节 五台唐建佛光寺东大殿——敦煌莫高窟五代壁画《五台山图》中仅存的大佛殿	193
第十一节 罕见的唐代佛造像埋藏塚——灵丘曲迴寺石像塚	195
第十章 “中国戏曲的摇篮”和雕版印刷中心	197
第一节 山西宋辽金元考古概述	197
第二节 五代遗韵与北宋太原城的兴建	205
第三节 丰富璀璨的戏曲文物，印证了古河东地区是“中国戏曲的摇篮”	206
第四节 平阳——金代著名的雕版印刷中心和木板年画之乡	220
第五节 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的重大考古新发现	223
主要参考文献	226
后记	228

绪言

中国考古学诞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原属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即二级学科，20 世纪 80 年代升为一级学科，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的我国第一个考古专业随即改为考古学系。1926 年以前，中国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由外国人把持，1926 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拉开了中国学者第一次独立自主地主持考古发掘，为中国考古学创立的序幕。紧接着，1928—1937 年由李济、梁思永等主持的安阳殷墟 15 次发掘，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基础。西阴和殷墟发掘，除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外，还产生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从事考古工作的人员不收藏文物，从那时开始，中国考古工作者一直恪守这条规定。20 世纪 90 年代，将这条不成文的规定正式列入了国家文物局制定的《文物工作人员守则》，除规定文物考古工作者不收藏文物外，还规定也不向别人介绍收藏文物，成为文物考古工作者强制性遵守的规则。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对什么是考古学作了如下诠释：“考古学属于人文学科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这里所说的遗迹包括宫殿、住宅、寺庙、作坊、矿井、都市、城堡、坟墓等建筑和设施；遗物包括工具、武器、日用器具、装饰品等。这些都是田野调查发掘的对象，通过对获取的这些对象的研究，探索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起源。

考古学的产生有长远的渊源，在中国，东汉时已有“古学”的名称。《后汉书》中说马融“传古学”，贾逵“为古学”，桓谭“好古学”，郑兴“长于古学”。这里所谓“古学”是专指研究古文经学，实际也包括古文字学。北宋中叶，“金石学”诞生，其研究对象只限于古代的青铜彝器和石刻。到清代末叶，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从铜器、石刻扩大到其他各种器物，所以人们主张将金石学改称为“古器物学”。由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古器物学”已接近于近代考古学，所以也有人把欧洲文字中的“考古学”一词译为“古物学”。其实，中国的这种“古器物学”并不等于考古学。我们这里所说的考古学，是指近代才发展为一门科学的考古学。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中国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才在中国诞生。

考古学是一门涉及面极广的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学

科都有关系，尤其是与历史学关系更密切。历史学可为考古学提供打开古代社会历史之门的钥匙，考古学可印证历史记载的真与伪，两个学科紧密结合探索古代社会的历史与文明，是惟一正确的途径，现在越来越受到两个学科的重视。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什么是考古学》一文中说：“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只是物质的遗存，这包括遗物和遗迹。所以它和利用文献记载进行历史研究的狭义历史学不同。虽然二者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

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产生于 19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其特定的含义，专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的特征的一群遗存。也指同一时期中不同类型的遗存，或者同一地区时代有先后的不同类型的遗存。例如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器物，经常在一定地区的某一类型的居址或墓葬中共同出土，这样一群有着特定组合关系的遗存，即可以称一种“文化”。一个文化不能由一种特征来划分，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找到类似的文化因素。只有许多特征的综合，才能把一个文化和另一个文化划分开来。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普遍的作法，是以首次发现典型遗存的小地名（自然地名）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如西侯度文化、丁村文化、下川文化、东下冯文化等。也有用朝代命名的，如晋文化、北魏文化等。还有以地域命名的，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原文化、草原文化等。

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除了要解决时代和分期以外，还要研究它的内容、特征、分布范围、起源、发展，以及同其他文化的联系等。要对某一文化的内容有充分的了解，至少应对该文化的一处典型遗址作全面、深入的研究，以把握这一文化的主要内涵。

第一章 山西考古学文化综述

引子

新中国成立前，山西的考古调查发掘，包括外国人在内，仅有零零星星的十多次：

1926 年，李济主持发掘夏县西阴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半个蚕茧。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进行的考古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拉开了序幕。

1929 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后，梁思成等对山西等省的古建筑进行了调查（山西境内包括今大同、朔州、晋中、太原、临汾等市），并对山西、河北等省 20 余处古建筑进行了测绘，开创了科学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道路。这些调查和测绘资料，分别于 1934 年、1935 年由梁思成、林徽因撰写成《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和《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

1929 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中国杨钟健教授在保德、河曲、离石、中阳县地质调查中发现 4 处旧石器地点，这是山西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1929—1930 年，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山西公立图书馆对万泉县（今万荣县）汉汾阴后土祠遗址进行发掘。

1930 年前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董光忠等对山西保德和荣河、万泉（均今万荣）、文水、太谷等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

1930 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对太原天龙山石窟被盗及云冈石窟保护情况进行了调查。

1931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15 日，山西省立图书馆附设博物馆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研究所、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合作，由中国考古学家卫聚贤主持，董光忠参加，对万泉县（今万荣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乐器“陶埙”。

1931 年，梁思成、刘敦桢两教授组织调查测量应县木塔。来应县前，因不知木塔是否存在，梁思成便给应县照相馆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协助拍摄一张照片寄京。但又不知信寄给应县那个照相馆，便在信封上写上“应县最大的照相馆收”，并附足费用及回信的邮资。过了不久，梁先生果然收到了给他寄的应县木塔照片，喜出望外，于是 1931 年在大同古建筑调查工作结束后，便匆匆赶到应县，对木塔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测量。

20 世纪 20 年代末，山西省有关部门组织对全省名胜古迹和民间收藏文物进行了调查，

于 1931 年编印《山西省各县名胜古迹古物调查表》。

1935 年，山西省有关部门对 90 个县（当时全省 105 县）的寺庙进行了调查，共登记寺庙 10604 座，田地 11582 亩，款额 1736814 元。

1937 年 6 月，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 4 人调查发现了唐代建筑五台佛光寺东大殿（详见本书第九章第九节）。

1938 年和 1940 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曾主持发掘云冈石窟窟前遗址，但面积很有限。

1941 年，日本学者小野胜年、长广敏雄等人，首先开始调查晋冀两省北部的汉墓群，并对山西阳高县古城堡汉墓群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十分珍贵的文物。

1941 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日比野丈夫对太原、临汾、安邑（今盐湖区）、解县（今属盐湖区）、猗氏（今临猗）、临晋（今临猗）、河津、永济等 8 市县 57 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1956 年在日本出版《山西古迹志》（1993 年 5 月，山西古籍出版社翻译出版）。书中记载的文物古迹，现有的已不存在，如太原天龙山漫山阁（第九窟）窟檐建筑，临汾城内的大中楼、南禅寺，永济普救寺金刚殿和正殿、蒲州府文庙等。

新中国成立后，于 1952 年成立山西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文物局前身），1958 年成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得以全面开展，无论专业队伍和调查发掘规模，抑或学术水平，都大大超过了以往。这些调查发掘工作以配合基本建设为重点展开，并紧紧围绕以下重点研究课题进行：建立山西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编年序列；搞清山西新石器时代各个文化的面貌及其性质特点以及与中原其他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区别，特别是新石器早期文化在山西的分布情况；探索夏文化；探索商周时期在山西境内的方国文化；研究晋文化和三晋文化；研究秦汉边塞文化；研究北魏平城文化及其相关的其他北魏文化；研究宋金元戏曲文化等。

1.1954 年对丁村旧石器中期文化遗址的发掘，拉开了山西旧石器考古的序幕。随后又发现和发掘了以西侯度、匭河为代表的一批旧石器早期的文化遗存；以下川、峙峪、柿子滩为代表的一批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截至 2011 年，山西共调查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460 多处（地点），早、中、晚自成序列，其数量及时代的连续性、文化价值等均居全国之首。

2.新石器考古，其前仰韶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庙底沟类型及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等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都有大量和重要的发现。尤其翼城枣园、武乡牛鼻子湾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填补了过去山西没有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空白。陶寺遗址的发现